

藏書家
BIBLIOPHILE

主編

宮曉卫

執行主編

李國庆

王振良

吳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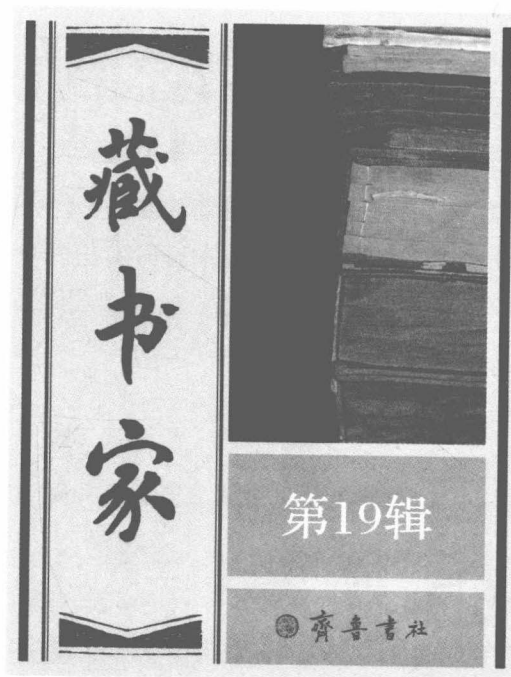
藏書家



第19輯

齊魯書社

BIBLIOPHILE



主编 宫晓卫
执行主编 李国庆 王振良 吴苏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 第19辑 / 宫晓卫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2

ISBN 978-7-5333-3286-0

I. ①藏… II. ①宫… III. ①藏书—文集 IV. ①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9248 号

藏书家 第19辑

宫晓卫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制 版 北京三希堂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286-0
定 价 28.00 元

《藏书家》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姜德明 李致忠

主 任：李 培 付双全 官晓卫

特约审稿人：周 晶 韦 力 杜泽逊

编 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子善 范景中 龚明德 李际宁 刘玉才

彭震尧 沈 津 时永乐 涂宗涛 王稼句

韦明铤 翁连溪 谢其章 徐 雁 薛 冰

杨成凯 郑伟章

主 编：官晓卫

执 行 主 编：李国庆 王振良 吴苏林

目 录

- 开卷新谈 01 谢其章：旧期刊收藏的若干问题（上）
- 藏家点将 06 陈德弟：藏书家王献唐先生事功述略
14 高洪钧：藏书家似兼山生平事迹辨正
- 天禄寻踪 21 郑伟章：宛平王氏藏书考
28 李 军：韩氏读有用书斋藏书的归宿
- 书海披沙 35 刘玉才：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汉籍三种
41 沈 津：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
45 彭震尧：观校读本《梦窗词丙丁稿》记
52 柳向春：康熙刻本《六书通》
56 杨 健：蒯光典致严修书札
- 簿录萃英 61 张元卿：民国通俗小说过眼录（上）
73 杨 栋：珍藏孙犁
- 馆藏故事 76 宫晓卫：“宋本《周易》”考辨记
83 李致忠：陶陶室藏“两陶集”流传始末（下）

缥緗闲话	91	杜泽逊：影印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序
	95	顾 诤：明清古籍试印本两例
文津茶座	99	李炳德：章式之先生的校书
	108	苗怀明：郑振铎及其通俗文学收藏
	115	葛培林：孙中山的藏书及其特色
故纸遗闻	126	雷梦辰：津门书肆二记（三）
	145	由国庆：《妇人画报》旧风景
故老追怀	148	李国庆：我随来老编大书
	154	侯 军：高山仰止邃谷楼
琅嬛琐录	157	韦 力：寻访藏书家墓地（一）
	168	姚一鸣：旧时上海书林三记
	176	韦 泱：我爱藏书票
	184	编后记

旧期刊收藏的若干问题（上）

谢其章

一九一九年，一位传奇女子雪维儿·毕齐（1887—1962）在巴黎左岸开了一家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这间传奇的书店不仅成为文人雅士汇集的聚点、文化交流的中心，更成为一直以来人们梦想中向往的一家书店——它是书店，任何冷门的期刊女主人都会帮你弄来。

上面这段话是台湾“网络与书”版《莎士比亚书店》广告语里的一段话。我注意到“任何冷门的期刊女主人都会帮你弄来”这句，想起我们的琉璃厂的松筠阁当年也是“万种杂志任君选”，书店的老板刘殿文书业称他为“杂志大王”。

一位德国藏书家说：“在非书籍物品中，杂志与书籍是最为接近的，需要加以特别的关注。如果我们不是想零零碎碎地买来阅读，而是意在收藏的话，就会发现，杂志收藏比书籍收藏困难得多。”我感觉找到了一个知己，在我们这倒听不到这样的话：“按照发行年份完整收购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发行的旧杂志，几乎是不可能的；靠自己逐年积累，那是很费劲的，但如果成功的话，却也是很令人欣慰的。”这位藏书家还说：“杂志收藏绝对是值得提倡的，一来经济条件不够宽裕的收藏者仅凭毅力和机灵也能取得出色的成绩；二来无论在日用装潢美术方面，还是就文字内容而言，杂志都能提供书籍不能提供的东西。”

关于旧期刊的重要性，藏书家唐弢曾多次强调：“我对期刊的兴趣很大。过去和年轻朋友合编现代文学史，第一个要求便是不要以作家编定的单行本为满足，而要读一读作品发表当时的期刊。我以为这样做，不仅可以看到作品的最初面目——掌握第一手材料，又能了解同时代人的状况：还有哪些人写

过同样的题材和主题，哪些人不同意这个题材和主题，以及为什么这个题材和主题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大家的关切。”

唐弢还说：“没有横的时代面貌，也就写不出纵的历史发展的脉络。期刊在这里可以提供许多信息和线索，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位德国藏书家也说了与唐弢相似的话：“杂志的重要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对于文学作品收藏家来说，杂志尤其不可忽略，因为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杂志上首先发表的，由于人们对杂志远远不像对书籍那么重视，所以这样的初版比（后来的）书籍形式的初版难得的多；此外，文学作品收藏家还能从杂志中了解当代舆论对某个美学问题或文学流派的想法，从评论栏中熟悉文坛现状，杂志能最直接地表现作家的职业生涯。”民国旧期刊的文献性、资料性、文学艺术性、珍稀性已日渐凸现并受到重视。各大小图书馆资料室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保护与收集古旧期刊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将那些“珍稀期刊调到古籍善本库进行保管了”（于天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珍稀期刊题录》前序）。于天池教授还讲道：“实际上，就纸张和装订而言，期刊的生命力较之古籍更脆弱，更需要阅读和保管上下功夫。”

除了唐弢之外，藏书家姜德明、胡从经也是非常注重期刊收集的，胡从经有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的主张。姜德明是写作旧期刊文章篇数最多的藏书家，我在收藏旧杂志的二十年间，有幸得到姜先生的直接教诲。我在旧书刊的收集上，更多的力量是放在旧期刊方面的，体会较深，有一些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

一、期刊收集的最大难点：全套不全

十年前，有幸与收藏家马未都做过一期电视收藏节目。我是收藏者，展示藏品并讲述故事，马先生是嘉宾，他对每位收藏者的藏品进行点评。收藏者带的藏品五花八门，马先生确实了不得，每件藏品他都能点评得头头是道。评到我带的《人民画报》创刊号（1950年7月），马先生说这本画报很难得，收藏杂志的难点是在能够收集到全套。真是一语中的，收藏家多通晓自己专藏的一门，对于行外的东西知之不多，马未都是全才。

期刊收藏，难点诸多，最大之难点，全份无缺是也。求全之心，人皆有之，譬如集邮、集币，都是同一心理。求全历程，千回百转，非过来人难以体会。有一点也须庆幸，正是由于多数藏者对于零本杂志不感兴趣，他们觉的要藏就藏全套，没有耐心一本本去配齐，这种想法就给了我可乘之机。一本不起

眼的杂志，也许就是我寻找了多年的那一本；也许我的一套杂志就差这一本就全了。

掌故作家郑逸梅曾说：“旧时所出杂志，全份无缺者，往往得善价而沽，盖近年颇有人以重金征求也。”（《旧杂志》）香港七十年代文史杂志《大人》，全份42期，近日在某旧书网拍卖，以12000元成交，而单册的《大人》不过一百元一册而已。这种几十期为一全套的杂志偶尔尚可有机会碰到，而上百期甚至几百期一套的杂志你是很难给它们配齐全的。356期为全份的《立言画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出版），我最先是一下子得到了前200期，200期之后的也陆续零星淘到了几十本，但是以后就慢了下来，至今我早放弃了集全它的希望。

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刊物多寿命不长，三五期、一二十期即停刊的比比皆是。期数少，同样不容易集全，因为这样短寿的刊物往往印数少。印数少，存世就少，存世少自然收集不易。出版年头长出版期数多的刊物，譬如《东方杂志》（1904—1948年）、《小说月报》（1912—1931年），虽然多，但还是不易集全，然惟其不易，更会激起我们收藏的欲望，这也许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

二、珍爱最是第一声

许多藏友把收集期刊的重点放在“创刊号”上，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较为经济的策略。我十几年前收集创刊号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今天创刊号竟成了收藏品中的热门货，也绝不会想到价格会涨到如此令人心动的地步。嘉德古籍善本2005年春拍，一组近千件的民国杂志创刊号竟拍到了30万元，中国书店的拍卖，一次上拍了近三百件，卖了近十万元，最近的一场大拍上了九组创刊号，成交七组。拍场如此热闹，私底下的交易也是“购销两旺”，一派大好形势。眼瞅着自己的藏品迅猛增值，当然高兴，但当有记者采访问到——“你当初是如何先知先觉意识到创刊号的升值潜力的？”我只能实话实说，当初纯粹是出于个人喜好，脑子里一点投资的概念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先知先觉了。过去收藏是收藏，跟投资风马牛不相及，现在观念截然不同，收藏必须与投资增值挂钩。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当年我哪怕有三分之一的投资理念……今天……就更……”当然，我也抓住过一次难得的聚增藏品的良机。本世纪初，中国书店旧书店举办民国期刊展卖会，本人一连数天探宝寻珍，擒获民国创刊号数百种，皆至精至罕之上品，直杀得天昏地暗，财政亦“弹尽粮绝”，不得不鸣金收兵，这样的机遇以后再没碰到过。

期刊杂志之创刊号，实在是文化历史的足痕，却像一粒粒散落的遗珠，零落成泥碾作尘，任其自生自灭，少人关心。20世纪30年代琉璃厂旧书肆老店松筠阁主人刘殿文，蹊径独辟，专事搜罗古旧期刊，晨昏寻访，随见随录，聚沙成塔，竟亦辑出《中国杂志知见目录》十余册稿本，遗惠后来研究者，唐弢曾撰文称赞。前辈风流，人往风微，余虽志大才疏，却效仿前人的作法，亦步亦趋，见一录一，一刊一影，倒也出版了两本“创刊号”专书，一时亦颇受好评。但我始终不是一个创刊号的专门搜集者，创刊号——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众多审读文化现象的视角之一手段之一罢了。

收藏者在面对不计其数的古旧杂志时，大多视为畏途，恐惧之下产生了一门“另类集藏”，那就是舍弃整份杂志的收藏，而腾出财力与空间，专事搜求杂志的第一本——创刊号。正是这一选择，成就了一门炙手可热的收藏门类。单就“创刊号”本身而言，它的确聚集了热门藏品的几个必备元素——大众性、亲和性、增值性、可赏可读性、展示性。

创刊号是一本新杂志的诞生，宛如初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潜蕴着生命的意义；创刊号又是新杂志的第一畦犁痕，播种下希望、知识、智慧、文化与心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众多的旧期刊爱好者喜欢把创刊号作为一个门类来什袭珍藏，一种嗜好的满足，更有一些老者也把收集与玩赏创刊号作为晚年的消遣。

“创刊号”一词最先使用于何时？是报纸先用的，还是期刊先用的？无从考证。我个人推断，“创刊号”的应用该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因为在此之前的杂志都是用“卷”“号”“期”来标明刊期顺序的，由于个人所见有限，实际情形到底是否如我所说，有待高明赐教。于此仅举笔者藏品数例：1914年创刊的《香艳杂志》，封面是丁悚（著名漫画家丁聪之父）画的“卧读图”，上面标“第一期”；《礼拜六》（1914年）封面只标“第一”，连“期”字也省了；《妇女时报》（1912年）标的是“第一号”；《消遣的杂志——上海》（1915年）封面写的是“第一卷第一号”；《滑稽杂志》（1912年）标“第一期”；《民权素》（1916年）与上述略有不同，创刊号标明为“第一集”。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青年杂志》的第一期亦循旧例，写的是“第一卷第一号”。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了“创刊号”，但仍旧有不少杂志采用旧法，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有杂志沿袭老规矩。足见传统的力量。

郑逸梅曾说：“古人所谓读万卷书，实则今书之一本，为古书之数卷。若以一本为三四卷，则万卷书仅三四千本耳。然亦有反其道而以若干本为一卷者，如刊行之杂志，月刊以十二本为一卷，旬刊以三十六本为一卷，周刊以

四十八本为一卷，故创刊号往往称为第一卷第一期，其相歧有如此。”（《围炉余话》）这是仅见的一段对创刊号“寻义”的文字。

除此之外，创刊号还有不少“别名”，那也是很有趣味的。如《红玫瑰》（1924年）的创刊号叫“特刊号”；施蛰存、周熙良主编的《活时代》（1946年）称“创始号”；《矛盾》（1933年）则称“发动号”；《一般》（1923年）叫“诞生号”。还听说有一种杂志的首本叫“露面号”，真有意思。1949年有一本《学生》杂志的第一本，不叫创刊号也不叫第一期，而叫“第一年第0期”，主编的意思也许就是一切“从零开始”吧。别出心裁的还有只在封面上画个圆圈，里面写个“1”字，表示这是第一本。更有甚者，表面上什么都不注明，那就要翻开里面，看看有无“发刊辞”一类的文字，一不留神，一本珍罕的创刊号就有可能与你擦肩而过。

一本创刊号总会伴随着一篇激扬文字的“发刊辞”，如《艺术界》（1934年）的发刊辞就极尽煽情之能事——“我们要贡献你的，热烈的精神；我们所希望你的，健全的心身。宛转着你歌喉的新春；流散着你肉体的清芬。向前跃进，飞着金轮！我们的小书呀；快飞去吻着青年的香唇。”《浅草》（1923年）的发刊辞美化如诗——“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尽接着沙漠，瞩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是谁撒了几粒种子，又生长得这般鲜茂？地毯般地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燥的人生。荒土里的浅草啊：我们郑重的颂扬你；你们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骄儿！”前几年已有好事者将历史上著名的发刊辞六百余篇汇集成书。

创刊号，不乏经典的书衣之作：如鲁迅装帧的《海燕》，陶元庆装帧的《语丝》，司徒乔装帧的《莽原》，丰子恺绘封面的《我们的六月》，叶浅予画封面的《清明》，丁聪绘封面的《人世间》。另有大量的创刊号封面无图画，用的是名家题写的书法，显示的是中国水墨功夫的另一样风采。将这些神韵各异的创刊号聚拢起来，无疑是一道奇特的艺苑风景线。

藏书家王献唐 先生事功述略

陈德弟

自古以来，在齐鲁大地上产生过许多风云人物，真是将相迭出，俊彦屡见。这里是孔子出生的地方，这里是军事家孙臆的故里，这里是“稷下学宫”的场所，这里是儒家学派的发祥地，这里是一代儒宗郑玄的桑梓……泰山脚下，沧海之滨，培育出无数的优秀人才，他们的英名流芳千古，代代传诵，十九世纪末诞生于照邑的王献唐先生名列其间，实至名归。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家国情怀，为保藏、承传华夏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伟大事功将永载史册。

一、王献唐先生的简单生平

王献唐，初名家驹，后改名瑄，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1896年10月出生于山东日照韩家村。父亲王廷霖，为当地名医，秉治病救人宗旨，给人医病，不收钱财，并资助无钱购药者，颇得美名。与此同时，他喜好金石之学，师从著名小学家许瀚（字印林）先生，搜集有关书籍，边医病，边治学，并行精进，著有《泉币图释》《说文札记》等书。

献唐先生幼承家学，博览群籍，聪慧苦读，为以后治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其父影响下，他不仅心地善良，而且较早立下志向，一定要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誉于后。他悟性极强，父亲看他是一棵读书治学的苗子，于是在他七岁那年，送他入私塾读书，以开其心智。在这里，他从私塾先生读“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

文》)”。十岁时,他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了,偶尔也模拟作一些短句练习。除此之外,他也学习书法、绘画等技能,久之,献唐先生成了村里有名的小书画家。

十一岁时,他离开家乡,只身到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因家道逐渐衰落,生活日益艰辛,为了缴纳学费和购置图籍,减轻父母负担,他白天读书学习,晚间不得不在一家报社打零工,依靠做一些简单的排字、校对等工作赚点钱,以维持学业。1913年,献唐先生从礼贤书院毕业,考入青岛德华高等专门学堂预科。是时,正值德、日为争夺青岛控制权而开战,故而献唐先生不得不休学。1915年,献唐先生重返礼贤书院读文科,翌年毕业。经济窘迫,生活艰难,继续求学深造是不可能了,从此以后,献唐先生再没能在学校学习。1916年,他只身来到济南,做起了《山东日报》的编辑工作,以挣钱糊口。1917年,他应天津《正义报》之约,奔赴天津,从事翻译德文小说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献唐先生未干多久,便重返济南,这次他担任了《山东日报》和《山东商务日报》的两报编辑兼记者。工作尽管有些辛苦,好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加之他勤学善思、满腹经纶,于工作比较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收入增多了,可以饱腹、购书、治学,不再为此发愁担忧了。

从1920年至1926年,献唐先生以山东两报记者身份,长期居住于青岛。期间,他撰写了《公孙龙子悬解》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他名望大起,蜚声学界。1923年,他还与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国人刘衡三、尹莘农等人,发起成立了民间社会团体“中德学社”,相互翻译并发表了一些中、德文艺、哲学方面的文章。

1926年6月,献唐先生来到北京,结识了当时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叶恭绰、傅增湘等人,与他们切磋学问、探讨学术,由是其学识大有长进,大有“脱胎换骨”情状。1927年3月,献唐先生到江西九江,从表兄丁惟汾学习《说文解字》《方言》,这是他研治小学和音韵学的开始。旋到南京任职,公务之余,撰写了《两周古音表》和《幽宵古韵考》二书。1929年8月,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这是他最喜爱、也最适合的工作。他为图书馆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四处奔走,利用各种关系筹措钱款,购置图书、文物,合理调配人员以加强管理,很快使该馆享誉海内,成为北方文化重镇。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在济南发现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勘查和发掘工作,和傅斯年、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筹办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历史文献,雄心勃勃汇编山东先贤著作,计划出版《山左先哲遗书》二十种(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尽如所愿),抢救

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聊城海源阁的书籍，撰写了许多考证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炎黄氏族文化考》，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他研治历史的理念。

抗日战争爆发，献唐先生为了保护馆藏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与同事屈万里、李义贵将这些书籍和文物装箱，亲自押运，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长途跋涉，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来到大后方四川重庆，保住了这些国宝，为保护、传承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重庆期间，献唐先生担任国史馆总纂修，撰写了《国史金石志稿》二十卷，之后又撰写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等，并编辑了《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四卷。

抗战胜利后，献唐先生返回济南，满怀壮志欲恢复和扩建原省图书馆，将运往重庆之书籍、文物再运回来。由于解放战争开始，山东战事较为激烈，献唐先生的计划暂时不能付诸实现，直至1950年，那些珍贵书籍和文物才重返故地。而此时，献唐先生由于操劳过度，患上了脑疾，不得不放下工作，赴北京就医。

新中国成立后，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等职，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抱病努力工作，并多次向国家捐献国宝级文物和古籍，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奖励。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中，虽工作繁忙，宿疾难愈，但只要病情好转，便手不辍笔，耕耘不止，撰写了许多论著，较为著名的有《山东古国考》《黄县兵器》《山东古代姜姓统治集团》等。

1960年10月，一代学术大师王献唐先生不幸与世长辞。据其亲属讲，他一生著述逾三千万字（2013年10月19—20日，在日照举行的“王献唐学术研讨会”上，其家属宣布）。献唐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多才多艺，一生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国家、社会和学术，是当今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王献唐先生的学术成就

献唐先生在历史学、考古学、音韵学、古文字、古钱币、古印玺、目录、版本、校讎诸学术领域均有研究，造诣颇深，成就卓著。不仅如此，他于诗词、书法、绘画方面亦有深厚的功力，多有佳品流行。

因为献唐先生博览群书，记忆超强，学术功力极佳，加上独具慧眼，所以他能将各种史料联系起来，综合进行研究、分析，发前人之未发，常有独到见解。颇能代表他史学成就的著作是《春秋邾分三国考》《山东古国考》《炎黄氏族文化考》等，其所用考证方法十分科学，因此所获结论之正确，一再被后

来所发现的文物证实。

献唐先生深知，研治上古史，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十分稀少，必须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如甲骨文、铭文等进行。这就需要认识古文字，而欲识古文字，必懂上古音韵。献唐先生于此颇有天赋，他从表兄丁惟汾仅学了三五月，便通晓了，并利用之而著《两周古音表》和《幽宵古韵考》；而其《炎黄氏族文化考》更是多赖识古文字之技能以助其成的，书中所持“中国文化虽属炎黄二族，但主要是炎族文化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的观点，有理有据，曾对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启发甚大，董称：“前所未闻，茅塞顿开。”

献唐先生父廷霖酷好研究古代钱币，曾著《泉币图释》一书。献唐先生决定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以弘扬光大之，于是他在古钱币方面用力甚勤，不仅多方搜集材料，而且精心探研，著出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成名作。该书五十万言，详细考证了先秦、秦汉铸钱技术的演变情况，从历史、制度、思想、物质等方面，考述这些钱币的历史文化内涵，对研究我国上古时期的货币史和社会史大有裨益。

古代玺印有多种功能，所刻文字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因此可以用来研究古文字、探讨古代典章制度等。由于献唐先生有很好的古文字功底，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他对古玺印文字持续地关注和潜心研究。据李勇慧博士讲，献唐先生“印学之题跋及编著达51种”（《一代传人王献唐》，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414页），由此可见献唐先生对古玺印文字研究之深、所获成果之巨。其代表性著作有《国史金石志稿》《五灯精舍印话》《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等。

献唐先生担任省图书馆馆长，整日与书籍打交道，耕耘书圃，又好收藏，手摸眼观古籍无算，因此谙熟古籍版本、目录之学。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林济青力邀献唐先生为学生讲授，由于全身心投入馆藏建设，工作繁忙，他初并不肯，林再三邀请，无奈答应下来。献唐先生一旦允诺，便一丝不苟，认真对待，他躬亲撰写了《目录学讲义纲要》，于“导论”中言：“今讲授此学，亦含版本、校勘两科，冶为一炉，遵中垒之义法，泯历代之成见。”（《齐大旬刊》四卷一期，1933年9月）由是而知，他在教授目录学时，也讲了版本学和校雠学。从1933年9月至1934年5月，献唐先生为齐鲁大学学生义务讲授版本目录学近一年时间（王献唐《太平十全之室日记》，未刊稿）。可以讲，献唐先生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造诣，于时亦为名家之一，留下了大量的阅读古籍的题跋，这些题跋涉及了古籍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今天研

究献唐先生古典文献学成就的宝贵资料。

献唐先生是一位酷爱收藏的大家，尤其在收藏古籍和文物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他收藏古籍和文物的目的不是用来赏玩，而主要是备研究之用。他无比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热爱自己的事业，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除维持正常生计外，剩余钱财多用于购买古籍和文物。在他的收藏中，个别书籍和文物属于国宝级，如宋版书《大方广佛华严经论合刻》、越王勾践剑、闯王李自成政权官印等。他是十分开明的藏书家，对于藏书有很正确的认识，他说：“藏书而不能研读，如不藏等。读书而不能流通，但供一己之受用，与人群何豫？刻书而无学识以济之，则斟校不精，鉴别不明。故善藏书者，必能读书；善读书者必能刻书；善刻书者，必能著书。以自身求书之不易，推及他人，故能藏者必能刻。以自身探讨之心得，启示他人，故能读者必能著。”（《李南涧之藏书及其他》，载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一集一期，1931年）本着这样的理念，他亦藏亦刻，除主持刊刻《山左先哲遗书》外，还影印了《穆天子传》《春秋左传》《通鉴纲目》等一批古籍，选拓了山东金石保存所庋藏的系列金石珍品，传播了祖国的优秀文化。

截至目前，据张书学教授介绍，献唐先生共有著述54种（张书学《探幽索贗，还原真实——〈王献唐年谱〉编撰手记》）。

一个人一生中有这些学术成就就很了不起了，但献唐先生才华横溢，于诗歌、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深厚的功力。就以他的诗为例，他每有所感，便赋诗一首，以记当时情状，所写的诗往往具有史诗性质。比如1917年，他到天津从事翻译德文小说工作，有诗云：“译书旁索瀛寰秘，纵笔欲穷鬼蜮情。”（《访碑图诗》）1918年，他复归济南，有诗云：“越岁文坛益征逐，乌鹊南飞明湖曲。”（同前）1919年，他父亲客死吉林，有诗曰：“芒鞋雪夜赋北征，麻衣扶杖沧海行。咫尺人天成代谢，沉沉万劫见死生。”（同前）1929年秋，他主政省图书馆，有诗云：“竭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现存献唐诗词六百馀首，为张书学、李勇慧夫妇收集编为《王献唐诗词辑存》一书。通过献唐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才艺，展示出其真乃旷世奇才、一代宗师。

三、王献唐先生的家国情怀

王献唐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位胸怀正义感、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勇于追求真理、具有独立思想与精神、舍命保

护“国粹”、积极传承华夏文明的先锋。他与时俱进的践行是学者的榜样，他家国情怀的品质足为学人楷模。

献唐先生仅活了65岁，在这65个春秋里，前后治学时间不过三十余年，中间又经历了主政省馆事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可他成就卓著，留下了三千多万字的著述，他的智慧和勤奋超乎寻常，这在发达的研学设备能辅佐学者治学的今日也是不多见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勤奋呢？我们以为是民族的自豪感和历史的使命感促使他竭力作为。

献唐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对祖国的历史谙熟于胸，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令他自豪，使他钦佩，深深感动着他，他把这种感动化作努力探研的力量，他惜时如金、一日并作二日用，著书立说，“兴亡继绝”，他要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尽最大力量弘扬中华文明、传承华夏文脉。他一生都在搜集、整理、保护古籍和文物，深知它们的文化价值，经常思虑如何使这些优秀物质文化不至于亡佚、被毁或流落异邦，所以他不仅效法周朝老子做“守藏史”，还以汉代刘中垒（向）自居，既藏亦校亦著亦传。他曾以诗歌形式表达过这种观点、表达自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承传：“我非嗜古爱腐朽，玩物丧志人所丑。又不欲以鉴藏名，身外陈陈复何有。寥落千秋字字金，字中能见古人心。生也有涯知无尽，欲从此处钩深沉。”（《访碑图诗》）他还说：“吾国固有文字中，中华民族之文化，所以寄存、滋息者在此，所以沟通、推进者亦在此。”（《评高田忠周之古籀篇》，载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一集一期，1931年）在他担任省馆馆长的头几年，不辞劳苦四处筹款，多渠道、多方法购置书籍和文物，“自1929年至1937年抗战前八年间，王献唐请政府增加经费，联系藏家，出入坊肆，或抢救，或购买，或没收，几年之间搜罗宏富，蔚为大观。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滕县等地新出土汉画石、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历城马国翰收藏泉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等山左文献和文物，大多网罗馆中，所收善本即达1700种35000册”（李勇慧《王献唐：齐鲁文脉守望人》，载于2013年1月18日《大众日报》）。很快使省图以庋藏富赡名扬全国，时任国立北图编委会委员、著名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先生致函说：“贵省图书馆得先生经营，收藏之宏富、建筑之良善，驾苏、浙而上，在省立图书馆中，屈一指矣！”（安可荇、杜泽逊等整理《王献唐师友书札》下册，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31年参观山东省图后记道：“闻王馆长主持此馆二年，搜罗昔人著作底稿已近百种。近为海源阁藏书事，奔走各方，至为劳勩。室中所悬书画，亦多新搜得之乡先达作品。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此馆必将巍然为北方文化重